

波斯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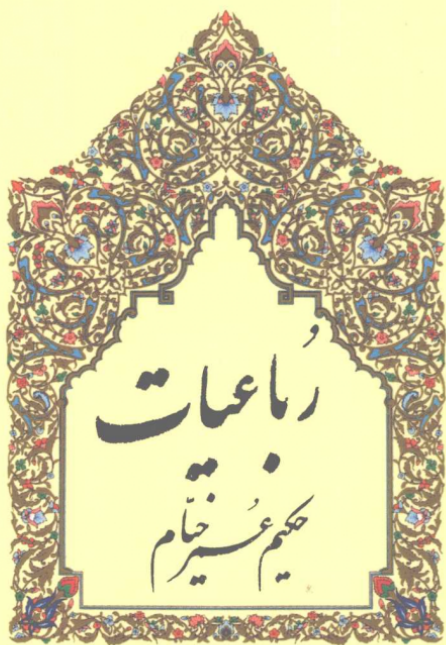
鲁拜集

海亚姆 著

张鸿年 译

حکیم عسکرم

湖南文艺出版社



رُاعِمَات
حَكِيمِ عُسَيْرِم

波斯经典文库

رُباعيات

鲁拜集

海亚姆 著
张鸿年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波斯经典文库

鲁拜集

责任编辑：萧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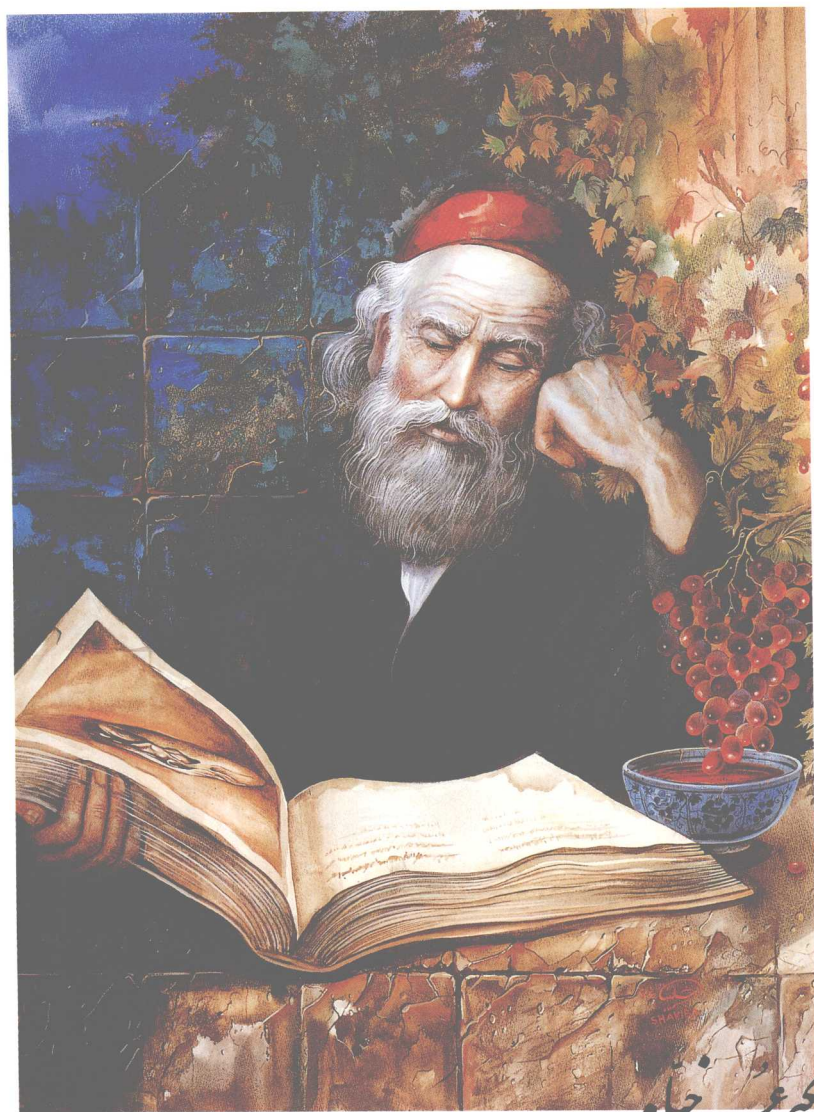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78 插页:36

字数:6000千字 印数:1-3,0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2346-3/1·1748}}{\text{定价(全18册):880.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本书译自波斯文《鲁拜集》
1941年德黑兰出版
穆罕默德·阿里·伏鲁基编选，
波斯文《鲁拜集》
1921年德黑兰出版
萨迪克·赫达亚特编选，
波俄对照本《鲁拜集》
1959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



海亚姆

حکیم خسرو جامی

波斯古典文学
世界诗苑奇珍
努力必物先大
中伊友谊常春

李美林题



二〇〇〇年四月

丛书总序

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波斯经典文库》，是一套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名著。古代波斯文学是蜚声世界文坛的高度发展的文学之一。^①对古代波斯文学的评价流行着一个权威的观点即“四大柱石”说。这个观点是伊朗著名文学家伏鲁基(公元 1875—1942 年)在一篇题名《伊朗文学》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说：“波斯散文和诗歌多不胜数，而且都值得重视。但是，照我看来，伊朗文化有四大柱石。伊朗人的教养应该基于这四大柱石之上，这就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莫拉维的《玛斯纳维》，谢赫萨迪全集和火者哈菲兹的抒情诗集。”^②

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这 450 年是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漫漫长夜时，亚洲文学就已高度发展，波斯文学与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异彩纷呈，鼎足而立，犹如三颗光亮耀眼的明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
- ① 伊朗人属雅利安族。伊朗一词可能是从雅利安衍变而来。波斯是伊朗南方的一个地区名(又称法尔斯)，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伊朗人不把波斯作为国家名。
- ② 谢赫意为长老或学者，火者意为贤人、智者或学者。

زباغات

古代伊朗(即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她幅员辽阔、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伊朗的主要民族是波斯人,这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民族,是一个具有不倦的进取精神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

伊朗东方连接着中国与印度,西方与希腊和罗马为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自然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和平时期,这里是各种文明荟萃之地。各种宗教教义、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从四面八方传入伊朗,经过伊朗人的吸收消化,酝酿发展,形成色彩斑斓的新波斯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伊朗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战争爆发,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人打出半岛、突厥人西进和蒙古骑兵的扫荡这四次震撼世界的战争中,伊朗都首当其冲,未能幸免。

波斯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几度兴衰,最终还是保持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没有中断。波斯文明承受住了亚历山大大军的冲击和希腊人80余年的控制,抗拒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和200余年的统治,甚至民族信仰的改变(由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也没有中断波斯文明的进程。研究阿拉伯和伊朗历史的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当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以后,同时出现了两个进程,即伊朗人伊斯兰化,阿拉伯统治者波斯化。入侵的突厥和蒙古人虽在伊朗也都建立了政权,但是终于被伊朗人同化,而成为波斯文明的保护者和传播者。

著名东方学家季羨林教授在《简明东方文学史》中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列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对世界文化

体系他作了如下阐述：“什么叫做‘文化体系’，我觉得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的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体系就叫‘文化体系’。”^① 这里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持波斯文明抗拒历史上无数次风暴和动乱，抵制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屹然不动并持续发展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度发展的古代波斯文学，是伊朗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波斯文明具有强韧生命力的标志。伊朗总统哈塔米 1998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强调了伊朗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描写了某些伊朗的神话传说，从而展现了在历史进程中岿然不动的伟大的伊朗民族精神。”在我们所介绍的伊朗中世纪天才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当历史进入 10 世纪，伊朗文学的百花园中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的勃勃生机。表面看，似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突然而至，实际上这时波斯文学的繁荣既植根于悠久而肥沃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也与现实形势密切相关。

为世人瞩目的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里就已经包括大量雅利安族早期神话传说和祭神的诗歌。中世纪的巴利维语文学已经相当繁荣，产生了史诗雏型《缅怀扎里尔》，传记文学《阿尔达细尔·巴伯康的业绩》，爱情叙事诗《维斯与朗

① 见季羨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第 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زباعت

明》，民间故事集《一千故事》（此书是《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之一），翻译作品有从梵文译为巴列维文的《五卷书》等。但是阿拉伯人入侵以后，巴列维语受到阿拉伯语的冲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进程发展。在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互相斗争的二百年间，一种西部法尔斯地区的方言传播开来，成为伊朗的通用语，即达里波斯语。中古波斯诗人们就是用达里波斯语进行创作的。^①

在当时条件下，民族语言的兴衰反映了阿伊两大民族间的深刻矛盾。达里波斯语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起步的。

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在伊朗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在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推行阿拉伯语，焚毁巴列维语典籍。不信伊斯兰教的人要为此而交纳税金。阿拉伯人把伊朗人称为“释奴”。释奴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参战时释奴不得骑马。释奴不得与阿拉伯人通婚。阿拉伯《乐府诗集》中有一则记述颇具典型性：一个释奴娶了一个阿拉伯女子为妻。有人报告了麦地那总督伊卜拉罕。这位总督派人拆散了这对夫妻，并令人打释奴二百鞭，剃去他的发、眉和须以示惩戒。这种高压政策在曾经是 大国国民的伊朗人的心中不可能不激起愤懑和仇恨。随后出现的“舒毕思潮”就是伊朗人反抗民族压迫的集中表现。^② 伊朗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分文武两个方

① 达里波斯语发源地有另一说法，即东部说，认为起源于东部霍拉桑。“达里”意为宫廷的。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到霍拉桑后，其宫廷使用这种语言，因而得名。

② 舒毕是阿拉伯词，意为“部族”“种族”。此词源于一段《古兰经》（49章13节）。伊朗人和其他被阿拉伯征服的民族以此经文证明伊斯兰教不应由阿拉伯人垄断，凡信教的人应一律平等。

面。在文化上,伊朗掌握文化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坚持用巴列维语写作以对抗阿拉伯语。在达里波斯语成为伊朗通用语以后,各地方王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提倡以达里波斯语写作。其中统治河中地区和霍拉桑地区的萨曼王朝(公元875—999年)是这些倡导恢复波斯文明的地方政权的代表。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公元850—940年)和菲尔多西的先行者塔吉基(约卒于公元977年)都是这个王朝的宫廷诗人。“萨珊王朝的国王属于伊朗一个古老家族。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在河中和霍拉桑地区竭力保护伊朗古代文化风习,尤其重视波斯语和波斯文学,鼓励诗人创作,尊重诗人文士,赠以厚礼”。^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达里波斯文学一经出现并迅速掀起高潮有几个先决条件:伊朗古代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坚实的文明基础;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通用语;阿拉伯入侵激起伊朗人的爱国热情;地方王朝对达里波斯语文学创作的鼓励与支持。

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分析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的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似乎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菲尔多西的《列王纪》问世标志着高潮时期的开始。当时主要矛盾是伊阿两大民族间的矛盾。亡国的哀痛折磨着伊朗人的内心,异族统治促使他们怀念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时代呼唤民族精神的颂歌,伊朗人迫切需要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寄托他们的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歌颂光荣历史的叙事诗应运而生,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

^① 见普朗沙基伊博士:《伊朗宫廷诗》第39页,伊朗出版社1970年出版。

زباعت

到了莫拉维和萨迪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伊阿两大民族矛盾已经趋于缓和。当时，开始是突厥人入主伊朗，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公元 1037—1194 年），后来蒙古人两次入侵伊朗，第一次在 1219 年，第二次在 1256 年建立了伊尔汗王朝（公元 1256—1335 年）。其间，还有花刺子模人入侵（公元 1194 年），每次外族入主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大量的杀戮。当时，伊斯兰教已经成了伊朗的主要宗教。这一时期特征是社会动荡不安，教派纷争不已。政治矛盾和宗教矛盾复杂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是一派触目惊心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人心浮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教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成了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萨迪和莫拉维的诗作中，更多地涉及到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诗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成分和教喻劝善的内容。

莫拉维是苏菲派长老。^① 他的诗比萨迪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他提倡一个人要以宗教思想为指导，清心寡欲，净化心灵，返朴归真，皈依真主。萨迪的创作则更具有世俗倾向。他以一个教育者的姿态劝喻世人要与人为善，行善济人，崇尚理智，学习进取。殊途同归，其实这两位大诗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十分接近的。这点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广为人引用的名言就十分清楚了。萨迪劝告世人：“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

①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部神秘主义思想派别。他们以诗文宣传自己的观点，形成苏菲文字。伊朗苏菲文学特别繁荣。苏菲一词是阿拉伯词，意为“穿粗毛衣服的人”。他们提倡清心寡欲，克己拜主，摒弃尘念，力戒骄傲（指不敬主）。他们提倡通过修行和吟诗狂舞而达到心灵与主的合一。

手足亲”，莫拉维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印度人与一个突厥人可能有共同语言，两个突厥人可能彼此疏远冷淡。共同语言体现共同心声，同心同德又胜过共同语言”。很明显，这两位大诗人所响往的都是人与人高度和谐亲密无间的大同世界。

晚于上述三位诗人登上诗坛的哈菲兹表现了对人的更多的关注。他比自己的先行者更关心个人的感情和命运。他深切地体尝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的不幸，谴责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畸形悖理，同情人的悲惨遭遇，他甚至从心底发出打碎不合理的社会的呼喊：

世上既然寻不到人的情义，
让我们再创造一个多情多义的人寰。

这些强烈不满现实，追求个人自由的心声正是稍后萌动于西方封建社会内部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内容。或许正是由于哈菲兹在东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对人的本质和命运的探索的道路上接近了这一历史的高度，黑格尔才赞扬他的诗“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① 德国大诗人歌德才对他发出由衷地礼赞：“哈菲兹啊，除非丧失了理智，我才会把自己和你相提并论。你是一艘鼓满了风帆的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不过是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舟。”^②

歌德对哈菲兹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中世纪的波斯文学以其“四大柱石”为光辉代表，的确处于当时世界前列。它的诗歌的优美的形式和华彩的篇章，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① 见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第 226 页。

② 转引自舒查尔丁·沙法译：《歌德论哈菲兹》（载《波斯散文选》第 560 页）。

زباعت

以及诗人们的诗行中所闪耀的理性的光辉都使世界文学爱好者为之赞叹。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涅·格鲁赛特(Rene Grosset 公元1885—1952年)说过一段评价伊朗文学的话,他的评价对我们认识波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或许有所帮助。他说:“伊朗文学中充满了人文主义内容和语言与思想的永恒的魅力。伊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罗马文学从中受益。伊朗文学引发了一场运动,恰如我们新时代(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一样,给人们留下了一座座精神宝库。萨迪和哈菲兹是这一文学的最完美的代表。他们不仅在伊朗名声卓著,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突厥阿拉伯人身居其中的亚洲,他们的作品像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此,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西方,从歌德以及其他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魅力和纯情抒情诗的影响”。^①

最早把波斯诗歌带到中国的可能是奔波于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在我国新疆曾出土摩尼的诗歌。北京牛街清真寺收藏有《列王纪》和《蔷薇园》的波斯文古抄本。据说,这是一位名叫阿赫玛德·布里塔尼·喀兹文尼的伊斯兰学者于1820年从伊朗带来的。这位在中国传播波斯文学的友人的墓就在这座清真寺。福州郊外一座伊朗人的墓碑上刻有如下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决了宇宙中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① 引自伊萨·萨迪格著:《伊朗文化史》第456面,泽巴出版社1975年第七版。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杭州居然听到一位中国歌手用波斯文演唱萨迪的抒情诗。明清之际《蔷薇园》已经作为我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13种基本教材之一。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也把目光投向波斯文学。1924年郭沫若从英文翻译了莪默·伽亚谟(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1927年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设专章介绍波斯文学,他指出:“中世纪的波斯,在文学上真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她曾被阿拉伯人入侵了一次,接着又被蒙古人所统治,然而她的诗的天才,在这个时代却发展得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正有类于同时的我们的中国。那时,我们也恰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所有近代欧洲人所熟知的弗达西、亚摩客耶、沙地、赫菲兹(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萨迪、哈菲兹——作者)等大诗人都产生在这时”。1934年伊朗政府召开菲尔多西诞生千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国《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号)于同年响应这一盛举,发表文章“菲尔多西千年祭”,并刊载译自英文的《列王纪》中故事《真犀德和曹亚克》(贾姆席德和佐哈克)。1947年穆斯林学者王静斋从波斯文翻译了萨迪名著《真境花园》(蔷薇园)。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萨迪,我国出版了《蔷薇园》新译本(水建馥译自英译本)。1964年出版了《列王纪》中最著名的悲剧故事《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潘庆龄译自俄译本)。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许多直接译自波斯文的名著相继出版。菲尔多西、海亚姆、萨迪、莫拉维、哈菲兹等诗人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再也不陌生了。此外,我国学者在德黑兰大学帮助下,于1991年(北京)和1994年(天津)召开了两次波斯文学讨论会。1991

زباعت

年，伊朗召开《列王纪》问世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学者多人应邀出席，并发表论文五篇，展示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我国学者研究介绍波斯文学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由借助第三国文字进行间接翻译研究，而发展到直接从波斯文进行翻译研究；由对个别作家诗人的零星介绍发展到有计划有系统地对波斯文学的全面翻译介绍。在这方面，比起先行的国家，我国虽然起步晚了200年，但是现在我们急起直追，已然赶上了他们。以这套《波斯经典文库》为例，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集中推出波斯文学中“四大柱石”的代表作。

这套丛书的译者都是不同年代的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的毕业生。有幸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脱离波斯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并且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翻译和介绍了一些波斯文学的名著。但是，像现在这样，大家集中在一起，形成合力，完成一套大型丛书，还应该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和认真切实的具体操作；感谢北京大学教授、德黑兰大学名誉教授季羨林先生和德黑兰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赛义德·贾法尔·夏希迪先生担任丛书的顾问。我们为能以自己的劳动填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感到欣慰。

《波斯经典文库》全体译者